

再論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

楊松

在前次「論七年來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一文中，主要着重於歷史上的敘述，是從歷史發展的觀點去研究七年來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現在我們却着重於研究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中某些具體的問題，站在一個比較客觀的立場上去檢查過去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在這篇文章內，講到四個問題：一，在東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底經驗和教訓。二，在東北抗日義勇軍內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三，在建立抗日根據地、抗日民衆政府及進行地方羣衆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四，敵人「討伐」游擊隊的策略及游擊隊對付敵人「討伐」的策略。

一 在東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經驗和教訓

在東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有那些經驗呢？首先從錯誤方面來說。國共兩黨同志，都曾經犯過一些錯誤。在共產黨人方面來說，在執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時，曾有極少數的個別同志，犯了兩種錯誤：一種是「左」傾的錯誤，表現在所提出的口號太高，而使許多其他抗日隊伍因害怕「赤化」而不願意來共同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還表現在友軍內（如抗日山林隊及其他義勇軍）工作時，在改善友軍內社會成分時，在排除惡習（如吸鴉片）及進行思想鬥爭時，沒有艱難刻苦的工作精神，沒有採用耐心教育和說服的方法；而犯了急性病，希望一下子就把友軍改造好，因而會採用行政的辦法，大批開除吸鴉片的與「胡子」流氓出身的隊員。結果，這些隊員離開出去，雖未投降日本，却真正去當紅胡子了。這種「左傾」錯誤還表現在：在「收編」口實之下，企圖取消其他抗日隊伍的原來組織，或是在建立聯合指揮部時不願吸收其他部隊的代表參加而一手包辦，結果也引起其他抗日部隊之不滿而退去抗日聯軍，就是在於未能

將已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和擴大起來。

另一種是右傾的錯誤，表現在共產黨人所領導的隊伍受了抗日山林隊及其他義勇軍的惡影響，個別隊員也打罵老百姓，拿老百姓的東西，有時甚至改變自己名稱而報山頭，結果失去共產黨人所領導隊伍底政治上的組織上的獨立性。這種錯誤也是由於害怕困難，由於沒有艱難刻苦的工作風，以致根本放棄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動上去教育和領導友軍，去消除友軍過去舊習慣和惡傳統，反而與之同流合污，向這些壞習慣與惡影響投降了。這麼一來，也是使隊伍不能發展，甚致遭受到失敗。

在東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不僅在共產黨人中會有個別幼稚分子了某些錯誤，就是在國民黨內也有某些同志犯過許多嚴重的錯誤。在第一個時期內（即自「九一八」事變後至一九三三年馬、李、王等失敗前），某些國民黨當局還曾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那是不用提了；就是當共產黨人改變了自己政策以後，會再三向個別國民黨員所領導的隊伍提議，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却不肯再三受到了拒絕，甚致還有個別國民黨員所領導的義勇軍，繼共產黨人所領導的軍隊的槍械。這麼一來，在客觀上正是中了敵人各個擊破的詭計。

但後來由於中國共產黨中央早在一九三三年春就在東北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由於在東北的共產黨員刻苦地執行這個路線的結果，並由於國民黨同志的覺悟，雙方共同糾正了這些錯誤。

在東北建立、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有那些好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採納的呢？

第一，在政治上，做到不分階級、黨派、信仰、宗教及民族等等之不同，部分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例如：謝文東乃依蘭土龍山的一個保董，他是一個地主出身，他底隊伍是在一九三四年春土龍山農民暴動時產

生起來的。他却同共產黨人趙尚志所領導的隊伍，共同合作一直到現在，共同建立聯合的指揮部，共同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又如國民黨員吳鵬成雖然曾經幾次拒絕同共產黨人建立統一戰綫，但是當他感覺得自己去獨幹陷於孤立無援，易受日寇之打擊，並也遭受內部隊員之反對時（內部隊員要求同共產黨人建立統一戰綫），他就終久還是同共產黨人所領導的王德泰及周保中等抗日游擊隊聯合起來，共同去和敵人作戰。還有如王營長所領導的抗日隊伍相信黃教，紅槍會相信迷信，雖因有宗教信仰不同，却也同共產黨人所領導的隊伍建立起統一戰綫，共同合作去打日本，結果彼此隊伍都有發展。

在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及第七軍內還有很多朝鮮人，那怕民族不同，那怕日本及其走狗韓人民生團分子之挑撥離間，但是中國人和朝鮮人隊伍却能共同合作，共同在共產黨人領導之下，互相尊重、互相批評及互相規勸，使得第二軍和第七軍發展起來。並且中國共產黨人爲着正確解決吉林省東滿間島韓人民族問題，曾經提出『中韓民族親密聯合起來共同抗日，建立間島韓人民族自治區』的口號。爲着實際幫助朝鮮民族的獨立，還會幫助朝鮮志士成立『朝鮮獨立軍』，不僅在東滿韓人民族區域打游擊，並且常到朝鮮內地去打游擊。中國共產黨人對朝鮮民族解放運動甚表同情，幫助朝鮮民族戰綫聯盟之活動。

第二，在軍事上聯合的總指揮部之建立，這也是一個好的經驗。在東北，這種指揮部並不是由那一個黨或那一個隊伍來包辦的，而是由各個不同的隊伍之代表共同組織的，總指揮及副指揮等也是由大家推舉的。共產黨人的政治眼光遠大，並不只是看見了自己隊伍的發展，他們還懂得僅僅靠自己的武裝力量是不能打出日本的。因此，時時刻刻都沒有忘記一方面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基幹部隊，同時也沒有忘記在軍事上政治上及幹部上去幫助友軍，以謀友軍之內部鞏固與擴大。共產黨人懂得：當着大敵當前時，友軍之失敗，即自己之失敗；友軍之勝利，即自己之勝利。毫不存忌妒的心理，而在共同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互相發展及互相進步。

在東北抗日義勇軍內部，也就是說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內部，並不是沒有磨擦的，這種磨擦是必不可免的。因爲在統一戰綫內部既包括有各種

不同的階級（如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一部分地主等）及不同的政黨（如共產黨及國民黨），那麼就必然產生階級利益的矛盾及政黨意見上之分歧。這正是客觀的辯證唯物論的發展規律，它是不依某一個人底意志的。問題就在：當目前民族危機時，怎樣能夠和平解決統一戰綫內部的磨擦，以便不致有礙抗日的神聖的偉大事業；也就是說實行『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基本原則。

在東北實際工作中，不知遇着多少這樣統一戰綫內部的磨擦問題，却因共產黨人的政治眼光遠大，以寬大態度作適當讓步，和平解決中國人內部的衝突。舉一個實際例子來說：一九三四年秋在吉林省東北部抗日義勇軍的隊伍非常複雜，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密山縣游擊隊，有李延祿領導的救國軍，有抗日山林隊亮山隊，有相信黃教的王營長隊等等不下十餘個隊。由於抗日戰綫內部發生了誤會，亮山隊曾與王營長隊聯合，把共產黨領導下一部分隊伍繳械了。當時在抗日戰綫內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團結在共產黨人週圍下的抗日義勇軍；另一部分則是團結在王營長、亮山週圍的隊伍。有些幼稚的共產黨員因當時亮山及王營長繳了他們一部分槍，就主張『討伐叛徒』，動員自己所有的武裝力量去打王營長及亮山。當時共產黨的上級領導者却沒有同意這個意見而主張和平解決內部衝突，曾再三說服：抗日戰綫內部亮山與王營長繳一部分抗日游擊隊的槍是不對的，客觀上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應將所繳槍枝發還。可是另一方面，清楚證明，即使因王營長亮山犯了這樣錯誤，可是如果主張去用武力解決，那就錯上加錯，就是抗日戰綫內部中國人自相殘殺，正是中了日本『以華制華、各個擊破』的毒計。因此又堅決反對武力解決，反對『討伐叛徒』的口號，而主張和平解決。結果仍然是和平解決了。雖然槍未發還，但是終久在共同抗日總目標下，重新聯合起來了，並且後來亮山隊王營長隊與共產黨人一伍共同打日本，提起往事，會再三道歉不已。像這樣的事，在東北曾發生過許多的。如像楊靖宇與王鳳閣，趙尚志與余九江，周保中與吳義成等等，都會因黨派、信仰及所代表階級之不同而曾發生內部磨擦，有時甚至衝突到幾乎要動武，但終因共產黨人顧全大局，終能和平解決內部磨擦，這確實是一個好的經驗，值得目前中國各地各黨派所領導的抗日游

軍隊的領導者所應效法的。

第三，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方式上在東北也有好的經驗。在東北建立統一戰線曾經採用以下的幾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在某個地方只有個別的共產黨員，沒有自己領導的隊伍，這時共產黨員那怕是一個人，他也應該參加抗日隊伍去，實地參加抗日的神聖民族解放戰爭，以盡一個中國人應盡的保護祖國的神聖義務。

第二種方式就是：在某個地方有共產黨人自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但是隊伍槍枝人數都很少，而在同區域內有其他較大的抗日游擊隊伍。這時，爲着對付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爲着不中日寇各個擊破的毒計，自然應當建立起統一戰線來。但是，由於共產黨人所領導的隊伍不大，在保存自己隊伍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條件之下，可以而且應該同其他黨派領導下較大的抗日游擊隊聯合，在軍事上受他底統一的指揮，或者受他底編制也是可以的。像在第一時期內間島各縣游擊隊人數很少，每隊不過三四十人，當時是受救國軍編制，爲它底別動隊。像這樣例子也有許多的。

第三種方式就是：在某個地方有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比較強大的抗日游擊隊，也有其他黨派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或者還有無黨無派的抗日游擊隊，這時就由共產黨人所領導的隊伍當發起人，向各抗日隊伍提議，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若是，因爲其他隊伍因主義信仰黨派等等之不同以及對共產黨人許多成見，而不願意建立統一戰線時，那時共產黨人所領導的隊伍竭力解釋：不要因主義信仰及黨派之不同而影響到抗日的偉大事業；並當大敵當前時，不可分散而中敵人各個擊破的計策。因而提議：若不能建立經常的抗日聯軍總指揮部，那麼就訂立暫時的作戰協定，共同去冲破敵人的圍剿，或是共同去襲擊敵人某一個市鎮，以便共同解決給養服裝等等問題，這一個提議常被採納。在共同對日抗戰鬥爭過程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及非黨員肩靠着肩手攜着手，在戰場上同敵人廝殺，他們的血流在一塊，分不清是誰的血。這麼一來，就消除了過去的誤會成見及宿仇宿怨，由暫時的作戰協定過渡到更高的統一戰線的形式，共同建立聯合的指揮部，甚至共同建立抗日的地方政府。

在東北，爲建立、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過程中，得出

一個結論：中國人抗日義勇軍內部「聯合則勝，分裂則敗」。這八個字成爲鐵一般的定律。因爲義勇軍內部一分裂，就中了敵人各個擊破的毒計，隊伍遭受到失敗和倒寇。義勇軍內部聯合起來，則彼此互相援助，互相發展，互得勝利，彼此的隊伍都日益擴大和鞏固起來。

這一個真理，在全國又何常不是如此呢？最近十四五年的歷史證明：國共兩黨聯合，則兩黨有利，國共兩黨分裂，則兩黨有害。這也成爲目前鐵一般的定律。

二 在東北抗日義勇軍內工作的經驗和教訓

在東北抗日游擊隊內工作，我們所遇見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怎樣解決游擊隊的槍桿子彈問題？因爲，我們是一個唯物論者，雖然知道刀矛也重殺敵，但是究竟不敵新式武裝的效力。在東北解決游擊隊的武裝問題時，有那些壞的好的經驗足供我關內各抗日志士之參考呢？

首先我們講壞的經驗。

第一個最壞的經驗就是：不用說服動員的方法，不用「有力的出力，有槍的出槍」的口號去動員民間的槍枝；而却強迫繳納民間自衛槍枝，引起民衆的不滿。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另一方面，因爲害怕收民間槍枝引起老百姓的不滿，因而根本放棄動員民衆槍枝的辦法，結果讓日本把槍枝繳去了，這也是錯誤的。若用政治名詞的話，前者可稱之爲「左」傾的錯誤，後者可稱之爲右傾的錯誤；雖有「左」右傾之不同，但是對抗日民族革命的事業有害却是一樣的。

第二個錯誤的行動就是繳「胡子」的槍，因而破壞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懂得，在東北各地抗日山林隊（紅胡子）雖然在行動上有許多不盡令人滿意處，但是在敵人後方用武裝力量去擾亂敵人的「治安」，滅絕敵人的統治，這在客觀上是革命的力量。因此，個別幼稚的共產黨員在反對「胡子」綁票的口號之下而去繳他們的械，想藉此解決自己的武裝問題，這是抗日戰線內部自相殘殺，在客觀上也是中了敵人各個擊破的計策，在客觀上也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

在東北解決游擊隊武裝問題上有那些好的經驗呢？

第一個好的經驗就是：同日偽軍作戰中去解決武裝問題。當然，由於寇軍尚頑強，所繳槍枝比較少。但是，從偽軍手中繳得的槍枝却很多。東北義勇軍對於偽軍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及『要槍不要命』的口號，在打仗時確實收到很大的效果，繳得很多的各種各色的武器。

第二個好的經驗就是：提出『有力出力、有槍出槍、有錢出錢』的口號，動員民間槍枝，向老百姓解釋，若不把槍拿出來抗日，被日本繳去，用來殺中國人。開始老百姓不相信，後來日本人真正開始繳槍，這時地方人民都將槍送到抗日游擊隊來，或親身去當抗日游擊隊員了。

第三個好的經驗就是：聯合各地方日偽所成立的自衛團、壯丁團、大牌隊等等，他們底內部成分都是當地老百姓，給養也是由當地農民籌的，日本人成立這些自衛團之目的，是利用中國人去殺中國人，表面上却說是『爲的掃胡匪』，『保護家鄉』。我們抗日游擊隊則提出：『抗日軍是真正保護國家的隊伍』、『抗日軍不是胡子，抗日軍保護中國人的生命和財產』、『爲着保護家鄉祖國，就要打日本鬼子』等等口號去聯絡各地方武裝自衛團，並且發動他們反正轉變出來，共同抗日保家。一方面由於他們受抗日軍的政治影響，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實力有限（無甲或每區自衛團不過三四十人），就常樂於同抗日軍聯合，或者拉出來當游擊隊，共同抗日。

但是，有些自衛團的團長甘心賣國當漢奸，雖經再三勸說也不覺悟，而忠心效力日本和偽國；這時抗日軍對待他們，就老實不客氣，把他們繳械，充作抗日武裝力量。

第四個好的經驗就是：抗日游擊隊經過地方的或統一戰線的關係，向偽軍偷槍買槍枝子彈，或是在最秘密的森林裏大山裏開小規模的修械廠，隊員在打仗時把子彈殼收起來，交修械廠重新裝置；並且自己造炸彈。這一辦法，在東北各地抗日游擊隊也是採用的。

第五個好的經驗是：利用自己隱報去劫敵人運輸軍火的火車、汽車等等。這在東北時常收到效果。

在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那個隊伍善於解決自己底武裝問題，則隊伍就發展；否則就不發展，或者失敗。

在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中，我們所遇見的第二個難題就是：怎樣解決游擊隊的給養問題。游擊隊與正規軍不同，既無固定餉項，也無固定的給養來源，全靠自己籌備，因此，就成爲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使得游擊隊的領導人煞費苦心，去謀這個問題之解決。

在東北游擊隊解決給養問題時，有那些壞的不好的辦法呢？第一個最壞的辦法就是『胡子趕邊疆』的辦法。這是一個什麼辦法呢？這就是抗日山林隊不會解決給養問題，而去亂搶亂奪。當抗日山林隊到某個農村時，把全村的人都包圍起來，像趕豬一樣，趕到一個大院裏去，或趕到大森林去，再去按票要價錢。這個辦法，當然是完全要不得的，這是脫離羣衆最危險的辦法，這是非常明顯，而當爲共產黨人所極端反對的。

但是，個別抗日游擊隊的領導者，爲着反對抗日山林隊的亂搶亂奪，這自然是對的——却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籠統地一般地在『不搶不奪』的口號之下，不去沒收漢奸與日寇的財產。當然對於中國人老百姓是不搶不奪的；但是，爲着解決抗日游擊隊的給養問題，對於日寇及漢奸的財產，就不能不搶不奪了。爲着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去用革命方法沒收日寇及漢奸財產，這就不是『搶』也不是『奪』；逮捕著名的漢奸，這也不是『綁票』了。可是，有些個別領導者會犯了這樣錯誤，在『不搶不奪和不綁票』一般的口號之下，對於漢奸財產也不沒收，對於漢奸也不逮捕，結果給養問題不能解決。在冬天還未換上棉衣，或在夏天還未換上單衣。結果引起內部隊員的不滿意，他們說：『當抗日軍還不如當胡子，因爲到了冬天，棉衣問題也不能解決。』於是，他們真的轉變出去了，雖未投降日本，却真的當起胡子來了，去向老百姓亂搶亂奪和亂綁票了。

在東北解決給養問題上的第二個最壞的辦法就是『拉大牌』。這是一個什麼辦法呢？這就是個別游擊隊的領導同志懶於去做羣衆工作，或者根本不懂得羣衆工作之重要，在游擊隊的給養和服裝時，只是依靠偽國的保長甲長，指定向某區某甲要多少給養和服裝。那些貪污的土豪劣紳，仍就把給養的負擔完全放在窮苦的農戶身上，一些大糧戶（大地主）反轉來出得少或完全不出，而甲長保長們甚至從中取利。這麼一來，就是有力的人既出了力，又要來出錢；而有錢的人既不出力又不出錢，這就是不

理的負擔了。這一個辦法，也會引起民衆的不滿意。

在東北解決游擊隊給養問題的第三個壞辦法就是：當游擊隊佔領某個縣城或市鎮時，亂沒收商人的貨物和財產，亂燒房子、亂綁票和亂殺人。這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辦法。

東北抗日游擊隊在解決給養服裝問題上，有那些好的經驗呢？

第一個好的辦法就是：聯合隊伍共同去打小市鎮，有時也打縣城，去沒收日寇及漢奸的財產、貨物及金錢；去逮捕著名的漢奸罰他們的款子。在打進城市前，預先準備好沒收隊和特務隊，專門負責沒收日本和漢奸的財產、金錢、貨物等等，對於那些中國商人的及和平的城市居民的財產則不沒收。還逮捕著名漢奸，依漢奸走狗所犯罪過大小，或罰款，或由羣衆公審，對於羣衆所仇恨的漢奸，則當衆槍決之。東北抗日游擊隊有會將偽國中央銀行外幣分行佔領，沒收款項達數十萬者；逮捕著名偽國機關的漢奸，加以罰款，也會是解決經濟問題的一個來源。這種辦法，既解決了經濟問題，又具體證明給城市中國人看：抗日軍不是胡子，是真正保護中國人生命財產的隊伍，在城市內也就易於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了。

第二個好辦法就是：在「有錢出錢、有糧出糧和有力出力」口號之下去動員救國公糧，把這個負擔放在大富戶身上。工作方式是游擊隊的名義，或派代表，或致公函，向各地著名大糧戶索取，說以救國大義。同時在羣衆中大加鼓動，自動捐抗日捐及救國公糧。若有某個大糧戶有錢不出錢，有糧不出糧，則一方面在羣衆中鼓動起來，反對他；同時，又用半威脅的方式，半強迫的方式，使其出錢出糧，如果毫不覺悟，則加以民族革命的制裁。這個辦法的好處，既是解決了部分的給養問題，同時也發動了羣衆，使其參加抗日羣衆的鬥爭。

第三個好的辦法就是：抗日游擊隊不老是駐在一個游擊區內，而是到敵人佔領的給養豐富的地方去打游擊，去打給養。這個辦法既可開闢新的游擊區，也避免因游擊隊經常在老游擊區內打游擊和打給養，引起當地老百姓的不滿意。

第四個好辦法就是：劫敵人運糧食的火車、汽車及大車。

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那個隊伍能够好好解決給養和服

裝問題，則隊伍發展和鞏固起來；否則，則隊伍人數減少，或者隊伍根本就解體了。在東北是有許多事實來證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

在抗日游擊隊內部做政治工作問題上，在東北也曾有過錯誤，然也有許多好的經驗。抗日游擊隊內部如果沒有政治工作，或是輕視政治工作，則隊伍內部不團結，打罵老百姓，亂搶亂奪。在隊伍中建立政治工作，即隊伍發展和鞏固起來。但是，政治工作人員若不懂得最低的軍事常識，工作方式不好，工作內容太抽象，不適合戰時需要，不能解決隊伍內部日常問題，則在隊伍內政治工作建立不起來，而政治工作人員的威信，也建立不起來。

在東北游擊隊內政治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游擊隊內政治工作的方式要適合軍事環境，工作內容要實際和具體，合乎當時當地的情況與隊員的情緒。在東北游擊隊內政治工作人員中有一個笑話，有一次，一個革命的青年學生到一個游擊隊上去當政治指揮員；但是，他對於軍事完全是一個門外漢。有一次當游擊隊與日軍作戰時，日本軍的重機關槍開火了，這時游擊隊員的步槍還未開火，他就心慌意亂地亂放一頓手槍，引起隊員的大笑，從此隊員也就不相信他底政治工作了。做政治工作者不一定是軍事專門家，隊伍內軍事上的領導是由隊長負責的；但是一定要有最低限度的軍事知識才好。如果預先沒有最低限度的軍事常識，則到了隊上也應馬上請教別人，否則就弄出許多笑話來。甚至也影響到政治工作的進行。

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隊伍內政治工作好，則隊伍發展和鞏固起來；否則，隊伍就不發展和不鞏固，有時甚至致要瓦解而失敗。

在解決游擊隊的幹部問題上，在東北也曾有過錯誤，有過好的經驗。錯誤就是：第一，做領導者的個人包辦主義，而不去培養大批幹部；結果隊伍發展不起來，有時這個人作戰時犧牲了，則無人代替工作，隊伍工作就受很大的影響。第二，做領導者的個人拚命主義。這是一個什麼「主義」呢？就是游擊隊的領導者有時過分的冒險，個人去拚命；平常在隊員中也不明白教育保護幹部之重要性，結果因這個過分的拚命主義，使得許多可愛可敬的幹部過早犧牲了。

在東北幹部問題上未曾着重注意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弱點。只有個別

隊伍（如第一軍及第三軍）部分注意到了培養新幹部，在大森林內曾開設了軍事政治學校，在司令部下有教導隊等等。

在東北抗日游擊隊上，曾部分糾正了拚命主義的錯誤，曾向領導者解釋：作領導者的一定要有準備犧牲的決心，無此決心的人是懦弱，根本就不能當一個游擊隊員，更不用說當領導者了。但是，這並非主張拚命，要懂得鬥爭是長期性的。並曾向隊員解釋：隊員要愛護和保護幹部，因為他們的生死不僅是他們個人的生死，而且關聯到全體隊伍的發展和存亡，因此，要愛護和保護幹部。

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幹部決定一切」這句至理名言是又被證實了。隊伍內幹部問題解決得好，則隊伍發展和鞏固起來；否則隊伍就不發展，甚至有時也倒台失敗了。

在鋤奸工作上，在東北也曾有過錯誤，也有好的經驗。「左」傾錯誤會表現在：隨便加人一個漢奸走狗的帽子，並且對於人命會犯了不慎重、不關心的錯誤，這在客觀上正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這些個別的錯誤，大肆宣傳抗日軍「殺人放火」。

也還有個別領導者犯了右傾的錯誤，就是，對於真正的大漢奸也採取「寬大」的政策，而不加以鎮壓，這在客觀上也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因為，對於真正著名漢奸不加以法律上的革命的制裁，則漢奸更加猖獗起來了。

在鋤奸問題上，也有好的經驗，逮捕著名的偽軍人所憤恨的漢奸，在公審後當衆槍決之。但對於受欺騙的小漢奸或漢奸嫌疑者，則不亂殺，由當地羣衆担保而釋放之，或加罰款，或不加罰款。這種辦法也是常採用過的。

三 在建立抗日根據地、抗日民衆政府及進行地方羣衆工作的經驗和教訓

抗日根據地對於游擊運動的發展有很大的意義，這是用不着詳細解釋的。在敵人後方佔領區域內，建立抗日根據地，必需有下列四個條件：第一，要有抗日的武裝力量。第二，要有廣大的羣衆抗日運動。第三，要有

代表民衆適合戰時環境的抗日民衆政府。第四，頂好，要有比較險要的地勢。但是，在目前全國對日抗戰情形之下，在許多地勢比較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建立起抗日游擊區域或抗日根據地。

在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第一個時期內（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東北曾有抗日根據地，當時吉東十三縣爲救國軍、自衛軍的抗日根據地。東邊道爲唐聚伍之根據地，江省之一部曾爲馬占山的根據地。這些根據地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後來又爲什麼很快地喪失了呢？當時所以能够建立起這些抗日根據地的原因，是由於一九三二年春上海局勢對日抗戰，同時敵人初到東北，統治還不鞏固，還顧不及遼寧縣城和偏僻地方，因此，當時很容易地建立起根據地來了。

但是，當時這些根據地的建立，是沒有經過廣大羣衆的抗日運動的。當時各縣政府有的未加以改造，有的是換湯不換藥，仍然用事變前那一套老辦法，去壓制人民，許多貪污分子乘機敲詐老百姓，強徵民間武裝。抗日軍隊雖然有許多，但和羣衆關係不好，隊伍本身政治工作也沒有，戰鬥力也很弱，游擊戰術也不會運用。因此，這些根據地不值口寇之一擊，很輕易地被敵人佔領去了。

在第二個時期內（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東北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客觀條件是比較不順利的，不僅沒有全國抗戰局面，而且局部抗戰的局面也沒有。但是，由於共產黨人善於動員羣衆起來抗日，並且經過抗日的羣衆運動而創造起一部分核心的抗日武裝力量，還建立起穩形的抗日民衆政府，曾經創造起珠河、東滿、磐石等區域的抗日根據地。並且這些根據地曾經支持兩三年，直到被敵人從四面八方進攻得沒有辦法時，才退出這些根據地，然而也還有一部分抗日游擊隊伍留在這些區域內游擊。

在東北第二個時期內的經驗說明：在目前東北及關內敵人後方建立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可能的。目前既有全國長期抗戰的局面，在各區域內又有抗日的武裝力量，目前的缺點就在動員羣衆參加抗日游擊戰爭方面，在敵人後方各游擊區內改造縣、區、鄉政府方面的工作才開始，組織羣衆武裝羣衆才開始。若能在這些方面大加努力，則是有一切可能條件，去建立穩

晉冀察邊區那樣的抗日根據地的。

在東北建立抗日民衆政府工作方面，也曾有一個錯誤，就是：在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春，曾於江省，未經發動羣衆也無抗日根據地而去建立『北滿抗日軍政府』。結果，雖然有相當的抗日游擊隊作爲政府的支持者，然而，仍然只是一個空架子，不能真正名符其實。這只是從反面來證明，在建立抗日民衆政府必須創造起抗日根據地，必須建築在廣泛的抗日羣衆運動上面，必需是從抗日羣衆鬥爭中產生出來的，才能支持長久，才能取得羣衆的信仰，才能完成領導抗日民族解放的偉大歷史使命。

抗日民衆政府應該是怎樣的政府呢？它應該是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地方政府，它應如晉冀察邊區政府一樣，是由各抗日黨派、各抗日軍隊及人民代表共同組織的；它應是服從我國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它應該是領導當地人民軍隊武裝抗戰的政府；同時又應該是一個比較民主的政府。它底威信和權力建築在當地全體人民和抗日武裝力量的身上。

根據東北的經驗，在這抗日游擊區域還未變成抗日根據地時，可以而且應該選擇某個偏僻險要山內或大森林內，建立臨時的游擊隊的密營（抗日山林隊所叫做的『地窖』）。它的作用就是在安置重傷的隊員（輕傷的隊員安置在居民家內），或作游擊隊的聯絡站，或作短時的游擊隊司令部。在抗日根據地問題上，在東北也曾犯了某些錯誤。有的人曾經根本否認抗日根據地之作用，有的人却死守根據地，結果根本違背游擊戰術的原則，使抗日游擊隊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在東北進行地方民衆工作中有那些經驗呢？首先就是關於抗日與民生二者間的關係，會有個別同志弄不清楚。有的同志會機械地把抗日與民生對立起來，而未看出二者之聯系。有個別同志會只着重了改善人民生活，而忽視了抗日。如：在第一個時期內，曾經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平分土地』等辦法（如珠河、東滿等地），結果是破壞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另一方面，却有個別同志爲着糾正這種錯誤，而跑到另一個極端上去，只抗日而根本反對或忽視改善民生。這也是錯誤的，因爲，這種忽視改善人民生活，就不能動員起廣大農民羣衆，結果抗日游擊運動發展不起來。

這個問題正確的解決應該是怎樣的呢？應該是既着重抗日，同時也要

在不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條件之下，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使民族革命與階級鬥爭配合起來。具體辦法就是：沒收日寇及漢奸財產，拿一部分財產用作優待抗日隊員的家屬。當地主們搬家到城市去，不在游擊區或抗日根據地居家時，他們底田地雖不沒收（指非漢奸的說），但是由抗日會提出減租或暫時不交租的辦法，因爲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口號之下地主們應當這樣做的。這個區域還可實行反對偽國苛捐雜稅，反對日寇抓車、抓馬、派糧、派草、抽丁拉夫等口號和要求，也是改善民生的辦法。

至於說，組織羣衆的形式，依照敵我統治力量大小不同的區域內，採取各種不同的組織形式。如在抗日根據地內，則組織公開的抗日會、農民自衛隊、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抗日兒童團等等。但在抗日游擊區內敵人討伐隊隨時能到的地方，則採取半公開的方式或是完全秘密的方式，並且採用各種合法的半合法的組織形式。在游擊區域內或抗日根據地內，動員羣衆去盤查行人，爲游擊隊放哨，動員羣衆去當游擊隊員，募捐慰勞游擊隊等等成爲重要的工作。而各抗日團體自身組織上的鞏固與對羣衆自己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至於在大工業中心城市（如哈爾濱、大連、奉天、吉林等等）工作方式與內容，與游擊區域內有很大區別，這是很明顯的。在城市內建立秘密的城市內各階層、各黨派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是很不容易的。在城市工人中去謀職工運動的統一，去把工人組織起來，因敵人的恐怖政策，也是很艱難的工作，需要很大的努力，去克服這些困難，這也是東北抗日工作中最弱的一環。

在敵人所佔領大工業中心城市內（如哈爾濱、大連、奉天等）工作方針是：收集和積蓄力量，準備將來全國的總反攻。因此，會糾正那種輕舉妄動、亂罷工、亂騷擾的傾向。因爲，對日抗戰是長期的抗戰，當我國還未到全面總反攻敵人所佔領中心城市時，過早的消耗力量，過早地被敵人破壞在城市中抗日團體，這是對於抗戰的偉大事業有損害的，這在客觀上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的。當然，在隣近游擊區域內的各縣城市鎮內組織兵變、罷工、武裝起義，以與游擊隊的進攻配合起來，那又是萬分必要的。同時，也曾反對那種輕視中心城市工作，那種害怕困難，在困難面前

投降，而不願刻苦的在城內作秘密抗日工作之傾向。

在東北偽軍內工作也是非常不夠的，對於日軍工作更是薄弱。這正像目前全國各條戰綫上一樣，是一個很大的弱點。對於偽軍的工作，是從三方面進行的：第一，當游擊隊與偽軍作戰時，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要槍不要命」等口號，唱抗日歌，發傳單標語。第二，經過居民去影響偽軍。第三，在偽軍內部進行秘密的工作。

四 敵人「討伐」游擊隊的策略及游擊隊反對敵人「討伐」的策略

敵人「討伐」抗日游擊隊是從各方面同時並進的。在政治上，「挑撥離間、以華制華、匪賊分離、民匪分離」十八個大字可以概括之。什麼是「匪賊分離」呢？就是把「共匪」與「馬賊」（紅胡子）分離開。日偽為着使「匪賊分離」起見，有時提出：「專打共產黨，不打山林隊。」有時又提出「專打紅胡子，不打抗日軍」等等口號。口號雖有不同，破壞抗日民衆統一戰綫的目的則一。

日寇爲着實行「民匪分離」的口號，乃用一切方法去挑撥人民與義勇軍的關係，並且實行保甲制度與歸大屯的辦法，去孤立抗日軍。

日寇「討伐」游擊隊的策略，在經濟上是實行經濟封鎖的政策，在國近游擊區實行糧食統制，並限制布、鞋、鹽等商品大批買賣。

日寇「討伐」抗日游擊隊的策路，在軍事上是把軍隊分爲守備隊與討伐隊，守備隊專門駐守城市、鐵路、汽車路及各重要軍事支點，依靠着工程，不出發或很少出發的；討伐隊則專門去出發，去打抗日游擊軍，並且利用自己運輸上技術上的優勢，對各地游擊隊採用各個擊破的策路。

東北抗日義勇軍用什麼策路來對付敵人的「討伐」呢？在政治上，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針對着「匪賊分離」的口號，提出以「不分黨派、信仰、隊頭等等不同，共同打日本」的口號；針對着「匪賊分離」的口號，提出「聯合民衆，共同抗日救國」的口號；針對着日寇「以華制華」的口號，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軍專打日本鬼子，不打中國人」的口號。對於敵人保甲制度，則依某地敵我力量之大小，民衆抗日情緒等等不同，而採取不同的策路：在抗日根據地內，則粉碎敵偽的保甲制度，代以羣衆的抗日組織；但在抗日游擊區，則如第一軍採取「將計就計」、「以毒攻毒」的辦法去對付敵人，在敵人統治力強大的區域；則用一切方法打進保甲制度內部去，利用合法及半合法的辦法來進行不合法的抗日工作。

在經濟上爲着冲破敵人封鎖，乃和城內中國商人聯絡，作私買賣。

商人以賺錢爲目的，只要採取的辦法恰當，是能解決部分的經濟問題的。有時還要冲破敵人經濟封鎖的區域，到未封鎖區域去解決經濟問題。

在軍事上採取機動的游擊戰術去對付敵人的「討伐」。敵來圍我時，在敵未圍前突破敵人包圍，到敵後方去游擊。常常比較巧妙地運用朱毛游擊戰的十八字訣，就是「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東北抗日游擊隊善於設埋伏實行夜擊、聲東擊西、神出鬼沒等等游擊戰術去積極地迅速地打擊敵人和消滅敵人。東北抗日游擊隊還有所謂「三不主義」，就是不打硬仗、不攻堅和不防守。

東北抗日游擊隊的領導者對於運用游擊戰術方面，也曾有過個別的錯誤。曾有個別游擊隊失去主動性，老在舊游擊區內兜圈子，不去積極的游擊，結果被敵人熟悉地形，原來是「我明敵暗」，即我熟悉地形，敵不熟悉，現在敵也熟悉地形了，即游擊隊失去了這個優點。老在舊游擊區內兜圈子，被敵人包圍起來，並因敵人實行燒殺恐佈政策，老百姓投家的投家了，地方羣衆組織破壞得很厲害，消息不靈通，羣衆援助也少了些，又失去了一個游擊隊的優點。

對於游擊戰術也可另一種不正確的了解，以爲游擊隊不打硬仗，因此就只是無目的逃跑，根本害怕同敵人打仗，結果隊伍也不能發展起來。豈知抗日游擊隊只有在經常與敵人作戰過程中，才能鍛鍊成爲一支堅強的游擊隊伍。

從研究東北七年來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得出總的結論，就是：在敵人佔領區域內發展廣大的羣衆的抗日游擊運動，必需：

第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分裂則敗、聯合則勝」，成爲鐵一般的定律。

第二，在游擊隊內必需正確解決武裝和給養問題，必需有頭等的政治工作，正確的幹部政策，在敵軍內有優良的政治工作。

第三，游擊運動必需與抗日羣衆運動配合起來，必需經常做抗日羣衆工作，經常去組織和武裝羣衆。

第四，必需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地方政府，服從中央政府之領導。游擊軍事計劃應與各地正規軍之作戰配合起來。

第五，游擊隊本身，必需有機動的游擊戰術，並且必需有靈通的情報工作。

第六，爲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爲着鞏固和擴大抗日游擊隊伍，在隊內必需建立共產黨的組織。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

論七年來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

楊 松

在六年半以前，當着日寇於「九一八」出兵東北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中央就會經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東北之目的就在：把東北變為日寇繼續進攻中國，準備武裝干涉蘇聯，準備在太平洋上與英美爭取霸權的軍事根據地；並且，日寇藉着這個事變來在日本國內更加壓迫日本的民衆和它底殖民地內（朝鮮、台灣）的人民。這一預言，很可惜地說中了。當時，共產黨人曾經着重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之目的，不僅僅在東北四省將把東北四省變為它底軍事根據地，且將要把中國全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把全國四萬萬同胞都變為日本的亡國奴。當時共產黨的這一忠言和警告尚未會為國人所了解。自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以後，這一真理逐漸為全國千百萬同胞所認識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軍隊、各地方政府和全國同胞，都在中央政府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之下，在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正在為着民族獨立、國家統一而進行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正在為着獨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國而鬥爭。

現當寇軍深入，在冀、察、晉、魯、豫和長江流域的江、浙、皖各省被敵軍佔領區域內，正在發展着被壓迫民族的廣大抗日游擊運動，如像，冀察晉邊區四十餘縣在我軍手中，冀豫晉邊區三十餘縣亦正樹着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又如魯東和江南各區的游擊運動等等。在這個時候，我們把東北七年來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介紹於國人，這，站在交換工作經驗以戰勝敵人的觀點上來看，是有一點貢獻的。

原來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向我國進攻，乃是利用了中華民族內部之分裂，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南滿路和奉天城佔領，這不僅對於當時東北民衆是出乎意外的，甚至對於當時我國政府和軍隊也是出乎意外的。當時，東北政府和軍隊相繼退至關內。但是，東北三千萬同胞，並不能將自己的家鄉和田園都搬到關內來，不得不留在東北，不得不起來

反抗日寇的殖民地民族壓迫，爭取自己的解放。既有日寇野蠻的殖民地民族壓迫，就不能不產生抗日的民族解放運動，這是必然的歷史發展的規律，無論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後到目前，在東北的抗日民族游擊運動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起至一九三三年一月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義勇軍失敗時止。第二個時期，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至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第三個時期，自去年蘆溝橋事變後至現在。現在，依照這個時期的劃分來觀察過去六年半來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之發展情形，並研究在這幾年內抗日游擊運動之經驗和教訓，這樣，既容易看出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目前之任務和發展之動向，亦容易供給關內從事抗日志士們之參考。

在第一個時期內，我們首先看見，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首先，在遼寧省產生了許多抗日山林隊（即日寇所稱做的「胡子」、「馬賊」）。這些山林隊，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專門以強劫發財為目的，在事變以後，却因農民恨日本的壓迫而又沒找着正當的領導和想不出抗日的具體辦法，乃去當「紅胡子」。因為農民分子之參加，並因帶着抗日的民族性質，因此它底性質與事變以前就不同，在客觀上帶着鬥爭的性質。

繼着抗日山林隊而起來的，有一部分東北軍和地方武裝隊伍不願退到關內，而願留在東北敵人佔領區域內和東北人民共同去抗日。這些隊伍把原來番號改變了，而稱為民衆義勇軍、自衛軍和抗日救國軍等等名目。例如，在遼寧省曾有前東北軍之一團長唐聚伍，在東邊道通化縣舉起抗日義旗，不一年而發展到七萬餘人，佔有東邊道各縣。馬占山則曾舉義旗於黑龍江省，李杜和王德林則曾起義於吉林。王德林原為一綠林豪傑，後改編為東北軍一營長，駐兵於延吉，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因反對日本測量隊測

最吉甯路而起事，會將日軍滅絕，而與民衆聯合，舉起抗日救國的旗幟，不一年而發展至八萬人以上，佔有吉東十三縣。此外尚有蘇炳文、馮占海等將軍及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等隊伍，總共不下三十餘萬人。當時抗日聲勢甚爲浩大。在此不能不指出，一九三二年上海十九路軍與第五軍之英勇防守，實給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以很大的推動。

在這個時期內，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特點有：

一，抗日游擊運動帶着自發的性質，形成當時自發的全民族抗日解放運動，却無具體抗日行動綱領與明確的政治目標及前途。例如說：當時東北工人、農民、學生、教員、商人及一部分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弟紛紛參加抗日游擊軍、自衛軍和救國軍等等，都紛紛起來打日本，保護家鄉。但是，他們只知抗日，而並不知道抗日的具體辦法和明確的前途。

二，當時不僅東北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未曾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同在國民黨影響下的抗日游擊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也沒有統一的領導與指揮，甚至互相攻擊，互相猜忌，互相排擠而至有互相殘殺的事情。如像，自衛軍在密山縣會把救國軍的蘇國長殺了，而救國軍爲求報復，又把自衛軍的馬憲章殺了。至於說把抗日的共產黨員逮捕起來或加以殺害，乃更是常事。這麼一來，就中了日寇挑撥離間和實行各個擊破的奸計了。如像，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海停戰協定以後，日寇會馬上將進攻上海的廣瀨第十四師團調回東北，先集中兵力擊潰馬占山於江省，再集中兵力攻取唐聚伍的根據地通化，轉而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又集中兵力擊潰自衛軍與救國軍於吉東。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將領相繼脫離東北，退出國境至蘇聯，轉道回關內去了。

三，抗日游擊軍與民衆關係惡劣。紀律好的隊伍，固然不少，然而，也有很大一部分隊伍的兵士和長官曾經保持舊東北軍時代的壞傳統，欺壓民衆，甚至有翻箱倒篋的事情，因而引起民衆之反感與失望。這是由於當時這些隊伍，除了救國軍有些宣傳工作（後又被解散）外，其他部隊無任何政治工作。加之，民衆本身亦缺乏組織，如農民救國會、人民自衛隊、婦女救國會、青年救國會、兒童團等等之沒有組織起來。因此，羣衆自己也無力量去影響軍隊，使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這麼一來，就給日寇挑撥

軍民關係之更大可能性。於是日寇到處進行許多欺騙宣傳，如像說：日本軍隊佔領東北是暫時的，爲國體好，即退兵；日寇到東北爲着「打倒東北軍閥張學良」，以着「滿人民族自決」等等欺騙宣傳。由於軍隊對於人民關係壞，而人民對軍隊又仇恨，在日本到東北開始時期內，確實有一部分將領接受了日本的欺騙。

四，在這個時期內游擊軍不善於作游擊戰，更不會運動戰，而只會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以前，從日本那裏所學的一套舊戰術，去做正規軍的陣地戰。以當時我國游擊軍游擊隊之武器來與敵人強大軍事技術相比，這樣就更容易受敵人擊潰。

以上就是這一個時期內抗日游擊運動之特點，同時也是當時運動之弱點。正因爲，會存在有以上的弱點，還加上其他國內之許多原因，東北第一個時期內游擊軍在起來時是轟轟烈烈像水一般地洶湧起來了；但是，當失敗時，也因內部弱點而又不能與敵寇堅持，也像潮退一般地很快地被敵人擊潰了。

這一個時期內東北游擊軍失敗之教訓，在目前對於我華北和江淮一帶被敵人佔領區內抗日游擊軍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在目前這些區域內的鬥爭的客觀條件，比東北當時情形好得多。在目前全國各抗日黨派已有初步的團結，特別是國共合作已是現成的事實，各省和各地軍隊都團結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周圍，在最高統帥指揮之下，向敵人作戰，同時因敵人殘暴的民族壓迫，引起羣衆反抗而願去參加抗日游擊隊，人民自動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實行自衛，並且有八路軍在冀察晉邊區敵人後方英勇作戰的模範例子，這都是當時東北抗日游擊軍所沒有具備的條件。

但是，在目前敵人佔領區域內也有各黨各派的抗日軍隊。他們雖然都是共同抗日的，但是，內部有互不相信仰，互相猜疑，互相妒忌的事，甚至有一部分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部分抗日軍隊將另一部分抗日游擊隊組織的事情。還有在抗日區域內各抗日縣政府和各抗日部隊缺乏統一的軍事政治的領導和指揮，有很少數部隊對人民關係還不好，游擊戰術還不會運用，而有時處在被動地位被敵人襲擊的事情。所有這些弱點，無論是在那一個部隊內或那一個區域內，都是非常危險而必須立刻糾正過來的，

否則，將來可能重複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一個時期內失敗之苦的教訓。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自一九三三年一月，東北義勇軍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義勇軍相繼失敗後，東北抗日游擊運動處在一個非常艱難困苦的時期。這時的困難表現在：

第一，因為抗日義軍之失敗，而反映到一部分羣衆失去民族自信心，感覺在強大敵人面前無辦法，而走向消極的道路上去。當着抗日游擊隊去同老百姓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和宣傳羣衆組織起來參加抗日游擊隊時，會有一部分落後的羣衆說：『你不要聽他們胡說，自衛軍和救國軍幾十萬人就沒有打倒日本，游擊隊還能够驅走日本鬼子麼？』因馬、李、王等義勇軍失敗而反映到羣衆中的民族失敗主義，確實給了當時抗日運動一個很大的困難。

第二，因馬、李、王等先後退出東北，一時義勇軍失去中心軍事政治的領導力量，一部分退到了蘇聯去，轉道回關內去了，剩留下的隊伍瓦解渙散，有的變了節而投降敵人，有的拉出去，真正去當紅胡子，想發財後回他山東老家去（因東北山東人很多），有的放下槍不幹而消極，出家信佛。這種失敗後的情形，確實給抗日游擊隊去重行整理隊伍增加了許多的困難。

第三，敵人在擊潰義軍主力以後乘機到處追擊和堵剿，到處搜山和燒房子，並且，向人民也開始了猛烈的進攻。假使說，在第一個時期內，敵人爲離間義勇軍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曾經故意實行許多欺騙宣傳，現當義軍主力擊潰以後，就老實不客氣地將自己凶惡的真面貌揭露出來了。於是，到處實行繳槍，繳照，派糧，派草，抓車和抓馬；強迫修公路，鐵路和飛機場；到處殺人，放火，強姦婦女；遍地設立鴉片零賣所和妓館，以麻醉和墮落我民族。以前爲着拉攏商人，曾欺騙地說反對苛捐雜稅；現在到處是苛捐雜稅，比以前更是增加數倍和數十倍，但對日貨則一律免稅或減稅，藉此排擠中國商業。對於中國工廠和作坊，如內中無日本股份，則加以沒收充公。學校內禁止講授中國歷史和地理，而要講什麼偽國歷史和地理，

實誦日本天皇歷代姓名；不僅馬、列主義的書籍被禁止，並且，誰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關內報紙，也有被逮捕和被殺頭的危險。並且，遍地實行保甲制度和十家連座法，禁止『爲匪窩匪通匪和勾匪』，如有一家與抗日義軍有關係，則十家同罪。

日寇這樣野蠻和屠殺的政策，當然給抗日團體和抗日游擊隊活動以許多困難；同時，這麼一來，反將原來日寇的欺騙宣傳自己替自己揭穿了。

在這樣艱難困苦條件之下，在東北的中國共產黨員並沒有害怕困難，也並沒有逃跑，而仍然刻苦的工作着。這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吸收前一時期內義軍失敗之經驗與教訓，乃提出在東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基本方針，而有著名的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信。

在該指示信曾經具體指出：在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內，不僅包括工人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小商人，學生和手工業者等），並且還包括一部分有產階級（軍官，資本家和一部分地主）。根據這一個基本的政策乃產生許多適合於這個政策的基本口號，如：建立統一戰綫的政府——抗日人民革命政府，以代替過去在東北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口號；建立統一戰綫的軍隊——抗日人民革命軍，以代替過去在東北建立工農紅軍之口號；實行沒收日寇及漢奸的財產和土地，以代替過去沒收地主土地和平分土地之口號；並且提出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綫的羣衆團體——抗日救國聯合會，主張在各地組織民衆，如像農民救國會，工會，學生和教員救國會，婦女救國會，青年救國會，兒童團等等。

中國共產黨首先在東北實行這個抗日救國的新政策，在東北實行這個政策之經驗，給後來和現在全國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新政策有相當的推動和影響的作用。還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就在東北提出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根據一些什麼呢？

它底根據就是：

第一，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由半殖民地變爲日本的殖民地，變爲直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民族壓迫，因而產生在東北中國人民中階級關係之變更，就是說，不僅工人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受日本的民族壓迫，要去抗日，並且也有顯著的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和一

部分地主也要去抗日，而來共同保護中華祖國和家鄉故土。因為，日寇不僅繳了農民的地照，而且繳了一部分地主的地照；不僅中國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不能和日本財政資本相競爭，而遭受失敗與破產，並且，就是中國民族工業資本家數十年來所經營的工廠和礦山，也被日寇強佔去了，或受日本財政資本之種種壓迫和排擠；並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僅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沒有絲毫政治上的權利和自由，就是在東北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地主也遭受日本軍閥和漢奸之排擠；不僅共產黨的主張和思想言論在東北是非法的，並且國民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的一切言論與活動也是非法的。這麼一來，在東北就造成各抗日黨派，軍隊和各階層人民共同抗日的經濟和政治基礎。

第二，在當時東北各地的抗日武裝隊伍，除當時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游擊隊是革命的隊伍外，其他各種抗日隊伍，無論是在國民黨影響下的馬占山、李杜和王德林的隊伍，也無論是非在共產黨也非在國民黨領導下的抗日山林隊與原始農民武裝隊伍（如紅槍會，無極道之類）也好，在客觀上都是革命的抗日武裝隊伍。因為這些隊伍那怕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曾經壓迫民衆過或欺侮過民衆，和民衆對立過，但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去與日本侵略者進行直接的武裝鬥爭，破壞和滅弱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統治，這在客觀上正是革命的進步的鬥爭。而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對它就採取援助的態度。這一估計正是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第三，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東北提出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還根據當時當地東北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及共產黨之政治影響而決定的。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看見東北人民的組織還是很弱的，共產黨的政治影響也是不普遍的。特別是，因為共產黨人看清楚了亡國滅種的危險一日迫近一日，在東北已被敵人佔領，全國都有被敵人佔領的危險，因此共產黨人首先願意在東北改變自己底政策，而來與其他各抗日黨派軍隊共同負起救國救民的重任。

自馬、李、王等義軍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員在東北執行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聯合和團結各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隊伍，共同去進行抗日游擊戰爭。在最艱難困苦的工作過程中，不僅保存原來抗日游擊隊的力量和基本幹部，並且鞏固和擴大了抗日義勇軍，創立起東北抗日聯軍十個軍，有十萬以上的抗日游擊隊四散在東北各地游擊，破壞敵人的交通，電綫和橋樑等等，牽制敵人很大一部分軍隊於東北，成為「皇軍」心腹之患。

東北抗日義勇軍是在非常困難條件之下產生和鍛鍊出來的。例如：第一軍楊靖宇，在未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以前，在磐石會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卅二軍赤色游擊隊，曾與其他友軍關係弄得非常不好，弄得隊伍內有槍多人少的現象，終因領導人不怕困難，正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糾正過去的錯誤，很快地改善了與各抗日友軍之關係，早在一九三三年多就會成立起抗日聯軍總指揮部，聯合各抗日部隊，共同擊潰敵人的討伐，沒有中敵人挑撥離間各個擊破的好計。否則，無論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或其他抗日義勇軍，實在都有被敵人各個擊破而被消滅之危險。其他如第二軍王德泰，第三軍趙尚志，第四軍李延祿，第五軍周保中，第六軍戴洪賓，第七軍李學福，第八軍謝文東，第九軍李華堂，第十軍汪雅臣等都是最艱難困苦的情形之下與敵人作戰的過程中鍛鍊出來的。

在這個時期內，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特點就是：

第一，在各地建立起初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不論黨派，信仰，主義，民族等等不同，不論階級出身之差異，都能在「抗日高於一切」的基原本原則上聯合起來，去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去共同爲着中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而鬥爭。比方說：吳義成是國民黨員，相信三民主義，王德林是共產黨員，相信共產主義，那怕黨派和主張之不一，但是共同抗日則是一致的。因此，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以前，相互關係曾經甚是惡劣，但自執行這個政策以後，終能在互相信仰，互相諒解和互相發展情形之下共同與敵週旋，而彼此的隊伍才不僅沒有被日寇所消滅並且大大地發展起來了。又如謝文東，本來是吉林省依蘭縣土龍山的一個保董，是一個地主，因憤恨日本的繳槍和繳照，曾於一九三四年在土龍山武裝起義，聯合松花江下游一帶農民，成立起自己的抗日隊伍；那怕他是地主出身，所代表的階級與共產黨人所代表的階級不同，但是，他能和共產黨員所領導的隊伍共同作戰，在四年來與共產黨員所領導的隊伍共同合作，共同殺敵，結果，他底隊伍得能發展，而共產黨員所領導的隊伍也得能發展。

又如，在第二軍王德泰部內，差不多有一半是朝鮮人，就民族歷史，風俗，習慣等等來說，同中國人大有區別，但因共產黨人實行真正民族自決和民族平等的政策，結果那怕民族不同，那怕在開始時中國人與朝鮮人隊員，彼此有許多磨擦，但是，在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朝鮮民族獨立總的政治目標下，終究能够團結起來，並已組織起朝鮮人的獨立軍，到朝鮮內地去游擊，喚醒朝鮮民衆上，已收到相當的效果。

第二，在義勇軍中建立起政治工作，首先是共產黨人所領導的隊伍內開始有這個工作，後來其他各抗日義勇軍相繼倣效。在人民內和敵偽軍內也有政治工作，如像對偽軍的中心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要槍，不要命』，『抗日軍專打日本鬼子，不打中國人』等等。抗日軍與偽軍作戰時，常唱歌喊口號，偽軍內兵士和長官有時受感動而不戰。有時，抗日軍與偽軍訂秘密條約，互不侵犯而專門去打日本軍，偽軍將日軍消息供給抗日軍，或偷着賣槍械和子彈等事情。這都是政治工作的效果。因為在偽軍內政治工作好，常有將偽軍內日本顧問和漢奸長官殺死而反正到抗日義勇軍方面的事情。

第三，軍民關係比較地改善了一些。首先也是共產黨員所領導的隊伍在羣衆中有很好的政治工作，特別是各地方有抗日會的組織，組織羣衆去勞動抗日義勇軍，動員羣衆去參加抗日義勇軍，在到處實行『有錢的出錢有糧的出糧和有力的出力』這一口號之下，去爲抗日軍籌給養，並在地方盤查行人，將漢奸活動消息，報告游擊隊，由人民和隊伍共同公審後，處決著名的漢奸，對於被日寇欺騙或被迫而作漢奸者，則酌量實際情形，看羣衆的意見，有時則給以自新之路。

第四，在這六年多抗日游擊戰爭中，從失敗和勝利中，學會了運用游擊戰術。在東北抗日游擊戰爭中，曾參考過去朱毛在江西井冈山時期內和俄國國內戰爭時期內的游擊戰爭之經驗，同時却估計到東北抗日民族革命的游擊戰爭與國內戰爭時的游擊戰爭之區別，估計到日本這個敵人和東北民情地形種種條件之不同，而很實際地和很具體地去依照實際情形決定和創造與敵人作戰的游擊戰術。在東北的游擊隊，特別長於在山地，森林內和雪地內的游擊戰爭。如像遼寧省和吉林省東部長白山脈，在江省沿內興安嶺山脈，都是大的森林和山嶺，很適宜於游擊活動。這並不是說，在平地鐵路公路和城市附近不能作游擊活動，恰恰相反，只要在人民中有工作基礎，並善於機警地運用游擊戰術，甚至在最困難的冬天和最緊張的敵人討伐情形之下，也可以在這樣地帶內活動的。具體的例子，就如離哈爾濱附近的珠河，賓縣，五常等縣哈東抗日游擊支隊，該隊曾在趙尚志同志領導之下幾度佔領賓縣，方正縣及五常堡，並曾無數次地破壞中東路之哈綏支綫。

在東北吉林省東北部下江，鏡河等縣游擊隊還以滑雪板而著名。到了冬天，這些地方雪很深，當地游擊隊員和隊長等都學會滑雪，行動非常迅速，使得日寇無法對付。

在這個時期內東北抗日游擊運動有以上的特點，這也是它底優點。因

爲，有這些優點，才沒有像前個時期一樣遭受那樣嚴重的失敗。然而，在這一個時期內的困難也是很多的，特別是敵人實行保甲制度和堅壁清野的辦法，以實行其所謂『民匪分離』之口號，增加了對於抗日游擊隊活動許多困難。敵人會集中很大兵力進攻游擊區域，特別是進攻游擊隊的根據地，強迫游擊區域人民歸大屯，敵人到游擊區域內將房子一概燒盡，強迫居民搬家到大屯內或集團部落內去，這就使游擊隊的給養及同羣衆的聯系發生許多困難。有時游擊隊被困在深山大森林內，沒有糧食吃，而燒土豆子吃或殺馬吃，亦是常有的事。到冬天要換冬衣時，敵人常實行經濟封鎖政策而使游擊隊換不上冬衣，因此在冰天雪地內而尚未穿上棉衣，常因敵情緊張而露宿於雪地森林內，有凍病者，有因露宿過多而得風濕病者。這些困苦情形，真是一言難盡。

在這個時期內，敵人針對着抗日義勇軍政策和口號之改變，他也提出許多新的口號。如像上面已指出的，針對着我們所提出的『抗日軍聯合民衆，共同抗日救國』，敵人則提出『民匪分離』的口號。針對着我們所提出的『聯合各抗日武裝隊伍』的口號，敵人則提出『匪賊分離』的口號，就是說將『共匪』和『馬賊』分離開，以實行各個擊破的策略，因此，有時日寇提出：『專打共產黨，不打山林隊』，有時又提出『專打紅胡子，不打抗日軍』的口號。這種口號雖然不同，但是破壞和瓦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則是一樣的。敵人還提出『匪賊歸順』的口號，用金錢和女人去收買一部分對抗日不堅定的動搖分子，有時培養一部分偵探和漢奸，派到抗日游擊隊內部，假裝共產黨員和抗日分子，而在游擊隊內起破壞和瓦解作用，並且乘機暗殺游擊隊的軍事政治領導人。這種陰險工作方法，在東北許多抗日隊伍內是發現過的。最顯著的例子如像：日本在哈爾濱的特務機關，曾在哈爾濱破獲了共產黨的機關，得知共產黨內情形和幹部姓名，乃派哈爾濱的哈字偵探長周光亞，假裝共產黨員，派到哈東珠河抗日聯軍第三軍去，說在哈機關破壞，不能留在哈爾濱工作，不得不逃到珠河抗日聯軍第三軍來，願當游擊隊員，去殺日寇。該軍軍事政治領導者未加詳細考查，就把他留在隊內，後來才撤負責工作。後來該日本偵探周光亞將三軍軍需長乘機刺殺，拐款潛逃到哈爾濱去了。只在後來，在隊伍上逮捕了日本一同派來另一個偵探，經該偵探供出，始知底蘊。

在這個時期內，東北抗日的客觀條件是比較地欠順利的。因爲，在上海和塘沽兩協定以後，東北義勇軍得不到着關內物質和精神上援助，在東北的抗日義勇軍之抗戰，實際上陷於孤軍獨戰之狀態。

自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以後，日本的進攻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也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全國對日抗戰對於東北抗日的游擊運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同時東北抗日游擊運動本身也起了和正在起着很大的變動。

這些變動表現在：

第一，雖然關內第一期抗戰和目前的抗戰尚不能直接給東北游擊運動以軍事上的幫助，並且，由於敵人的封鎖，在武器和彈藥上，也還不能給東北游擊隊以援助。但是，因為全國對日抗戰，牽制着敵人，不能像前一個時期內集中一切力量，去進攻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只是在過去八個月內的抗戰，敵人不得不動員一百萬以上的軍隊來華作戰，戰線由杭州至包頭，已延長為數千公里。這麼一來，就使敵人不得不將主力用來對付關內的中國軍隊，而不能集中兵力去打東北抗日游擊軍，這是比前一個時期內較為順利的客觀條件。

第二，在東北人民政治情緒上也發生很大的變化。以前東北人民天天在希望『關內出兵』，希望中國和日本打起來，飛機在東北驅逐日寇出中國。現在，在蘆溝橋事變以後，有許多人民自動參加抗日游擊軍，人民對於抗日游擊軍之援助也比較更積極起來了。

從前在偽軍中的流行口號為『維持現狀，等待關內出兵。』現在關內已出兵和日本打起來了，這時就不能和不應該維持現狀，而要反正殺賊，共同救國救鄉了。確實的，自從全國抗戰開始以來，我們看見許多偽軍或營成團的兵士和長官反正過來，投到抗日游擊軍方面來，這不能不說是好的現象。

第三，在前一時期內，因為敵人集中兵力去進攻抗日游擊軍，未曾有可龍去建立比較穩定的抗日根據地，不僅未曾有比較長久時間佔領縣城，成立抗日的縣政府，並且，就是企圖在人煙比較少和地勢比較好的森林內和大山內建立比較穩定的游擊隊根據地，也曾是比較困難而失敗了。舊有的游擊區域會被敵人破壞，新的區域又難建立起來，在組織羣衆和訓練隊伍與幹部上，會遇着許多額外的困難。這是蘆溝橋事變以前的情形。

在蘆溝橋事變以後，目前，東北情形變更了，因為敵人將主力用來進攻關內，在東北只能利用日軍駐守大的中心城市和主要鐵路綫，對於其他各地，則因兵力不够分配，並因偽軍之不可靠，以及人民對日仇恨，對抗日游擊軍之同情等等條件，東北抗日游擊軍乃有可能去建立比較穩定的抗日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內建立抗日的民衆政府，由各抗日黨派，軍隊和人

民代表來參加，共同建立起來。並在抗日根據地內訓練成百成千的各種軍事政治和地方工作的幹部，把當地民衆用各種方式（如反日會，農民救國會，農民自衛隊，工人救國會，學生救國會，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兒童團等等）組織起來，實行改善人民生活，將改善民生與抗日鬥爭聯繫起來。

雖然，目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鬥爭條件比前一個時期內順利一些，但是，正像全國抗戰一樣，在目前還正處在一個非常艱難困苦的時期。首先是，東北抗日游擊運動本身還存在許多缺點和弱點，如像缺乏統一的軍事和政治的領導，各地羣衆工作薄弱，抗日根據地之建立雖有可能和真實性，但是，這個可能還未變成現實，還需要很大的努力工作。在敵軍內，特別是日軍內工作薄弱到幾乎一點工作也沒有，城市內工作會幾次遭受到破壞而沒有都恢復起來。用最大力量，去克服這些缺點和弱點，這是爭取抗日戰爭勝利和去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所必需的條件。

在目前抗戰階段上，敵人還在猶豫，不僅還未受到致命打擊，並且還在向前進攻。在奪取平津和京滬之後，敵人在目前還正在用大迂迴的戰略以進攻武漢和西安為目標。我國抗戰在開始時的部分失利，這就給敵人和漢奸在東北作許多欺騙宣傳和吹牛皮的資料，說什麼『日本皇軍是百戰百勝的軍隊』，『不要抗日，安心作偽軍順民』。當日寇還沒有遭受更大的打擊時，還沒有吃幾個更大的敗仗時，這些欺騙宣傳或者能發生很少的效力。

實際上，東北的抗日游擊戰爭，正像全國抗戰一樣，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講的，目前抗戰是走的最艱難困苦的道路，走完這段艱難困苦的道路以後，才是順利的勝利的大道，就是說，我國抗戰是處在『先敗後勝，轉弱為強』的這樣一條道路上。

七年來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歷史是艱難困苦鬥爭的歷史，前一個時期內失敗之教訓，後一個時期內部分發展和部分勝利之好經驗，這些都是用東北民族健兒的鮮血所換來的。這些經驗和教訓，值得目前每個抗日民族戰士來研究和學習。特別是，當日寇佔領東北已六年半，而東北志士能够持久抗戰六年半，那種刻苦耐勞的幹勁精神，那種獨當一面的獨立工作精神，在那樣困難的物質條件之下，在那種嚴重失敗以後，不動搖和不喪氣。所有這些革命的精神，更是值得每個愛國男兒和巾幗丈夫去學習和效法的啊！

三月十五日

80

江蘇團報 12-30 期送

(1931.7-1932.2)



4402-13

申報 12期

1931. 7. 1

五四

因此，軍閥制度存在一日，各種奇形怪狀的苛捐雜稅是不會消滅的。財政的困難也不會消滅的。南京政府爲要掩蓋牠的反革命醜態，不得不宣告取消厘金，但是厘金取消之後，就用別種捐稅（特種產銷稅等）來代替厘金，不僅使厘金等於沒有取消，而且格外加重稅額。我們知道，無論什麼稅，無論牠在表面上是否工農民衆直接抽取或向企業主產業主去徵收的，一切捐稅的負擔終久是落在工農羣衆身上的。工農勞動羣衆要免去捐稅的重担，只有推翻國民黨的統治。

〔註〕 山西省因爲財政支絀兵士月餉只發一元，夫役每月八角。

滿洲經濟危機的深入

（滿州通訊）

輸出入大減

據關東廳（日帝國主義在遼東半島的統治機關）的調查，大連港，中國東北部唯一大港，本年三月份出入貿易額與去年三月份的比較如下：（單位日金圓 Yen）

	一九三一年三月	一九三〇年三月	減少額	減少百分比
輸出	一九・四四一・七二七・三〇・二四三・〇二五	一〇・八〇一・二九八	三五%	
輸入	九・九〇九・〇二一・一九・五五五・六二八	九・六四六・五九七	四九%	

從這統計看來，輸入低落較輸出尤甚，約減二分之一。

滿州輸出品向以豆糧爲大宗，按中國海關統計，約佔全輸出額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大豆約佔百分之三十九，豆餅豆油約共百分之二十一。但入春以來，豆類輸出額慘跌不已。就大連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四月七個月中，豆類輸出額看（單位基羅噸）

大豆 豆餅 豆油

	一九三〇年十月至三一年四月	六九二・六五九	四五九・三〇三	六〇・〇九九
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三〇年四月	一・三二一・一三六	六四五・九四五	七三・六九五	

按每年十月至翌年二月爲滿州特產物輸出季節，今大連港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四月之輸出額均比前年同期減少，大豆甚至減約二分之一，四月以後，輸出季節已過，輸出增加當更無望。

滿州特產向分二路，一由南滿路運載，一由中東路運載。據五月廿九時報載，除大連埠頭積存十九萬噸大豆，南滿路沿線有三十餘萬噸待售外，中東沿線積存更多，約六十五萬噸，比去年同期該路沿線積存額增四十四萬噸。

除豆類之外，其他特產品莫不如此。今將大連港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三月六月中各種雜糧輸出額與前年同期比較如下：（單位基羅噸）

一九三〇年十月至一九三一年三月		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一九三〇三月	
高粱	四八・五三七	五一・一一三	
包米	二〇・四二四	三六・四〇六	
小米	五・三六九	一・三三七	
小豆	四六・八二九	五〇・〇八四	
吉豆	五・五九八	六・五五〇	
蕎麥	一〇・三九二	一・九二〇	
芝蔴	六四二	九・五六一	
大蘇子	二・三五六	一九・四五八	
小蘇子	三・〇三七	五・〇五〇	
蘇子	一三・〇二四	一四・五九四	
麥皮	八・四七一	四八・〇〇三	
落花生	二八・二六七	四八・二五九	

除蕎麥之外，沒有一樣不減少的。在北滿方面，據中東路當局調查，至三月底止，中東路沿線尚存雜糧九十三萬九千餘噸，連松花江之四十萬噸，總計尚有一百三十四萬噸積存待售。

輸出入特別是輸出這樣銳減，當然是因為世界經濟危機深入的原故。

鐵路營業衰敗不堪

在特產輸出物減少之影響之下，鐵路營業非常不振。如南滿路本年四月中收入總額為六・五七〇・六三三日元，較去年四月份減一・八一六・七三九日元，其中貨車收入減一・一六四・九五一日元。四月以前，即南滿路一九三〇年度（一九三〇年四月至一九三一年三月）一年中總收入，九一・三〇七・三五九日元，亦較前年度減三〇・七九六・三八四日元，而其中貨車收入減少二四・八四八・〇五一日元，約佔總收入減少額之八〇％。

中東鐵路也是如此。據四月廿六日時事新報載，中東路一九三〇年度（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貨運為四・一六〇・〇〇〇基羅噸，比一九二九年度之五・五八八・〇〇〇基羅噸（此年因中東路事件影響已特別減少）減少一・四二八・〇〇〇基羅噸。與南滿路一九三〇年度運貨一四・九一八・〇五一基羅噸相較，不及遠甚。故今年中東路已將原定預算五千六百萬金盧布縮減至三千三百萬金盧布，約減四一％之巨。

在中國資本的鐵路方面，情形更為可憐。如主線北平遼寧路一九三〇年度收入總